

牛兵占◎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经典白话珍藏本

难经

译注



难经译注

主 编 牛兵占

副主编 张明泉 白建乐

编 委 金 丽 张拴成 李万辉

董建勋 田义龙 张 凯

魏 民 孙晓辉 杜美茹

苏俊龙 邢玉敏 时宇静

李文丽 郑彩华 李 英

魏宇澜 龚 克

中医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伊广谦

封面设计 于天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难经译注 / 牛兵占译注.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4. 2

ISBN 7-80174-200-1

I. 难... II. 牛... III. ①难经—译文②难经—注
释 IV. R221. 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6708号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 18 号 100700)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625 印张 408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一版 200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7-80174-200-1/R · 199

定价：16.80 元

前　　言

《难经》又称《黄帝八十一难》，是我国汉以前文化遗产医学典籍中的重要文献之一。其内容和体例是针对《黄帝内经》的某些问题设难答疑，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和发挥。“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内经》中的某些理论性问题作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作出了发挥性阐释。全书共设八十一难，对人体脏腑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

一、《难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首载《难经》书目的典籍，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序》，但未称何人所著。《隋书·经籍志》仅载其书名，亦未载其著者。唐初杨玄操在其所著《难经注·序》中称：“黄帝八十一难者，斯乃渤海秦越人所作也。”杨玄操《难经注》一书亡佚，其《序》收入唐·开元年间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旧唐书·经籍志》沿袭杨玄操的秦越人著《难经》之说。此后，《难经》为秦越人所著竟成为世传。然而详考其书，就其内容及文字气象而言，出自秦越人之手并无稽凭。秦越人世号扁鹊，为东周时渤海郡人，西汉·杨雄称其为卢人。秦越人生卒年代不可确考，或谓春秋时人，或谓战国时人。其生平事迹，《史记·扁鹊传》所载最详。但考其所诊治虢太子、赵简子及齐桓公疾病事迹，其年代相差悬殊。虢国于公元前655年被晋献公所灭，治虢太子事应在此之前。赵简子为晋昭公时大夫，晋昭公于公元前531年至公元前526年在位。齐桓侯如为姜齐桓公小白，在位应在公元前642年以前。虢太子、齐桓侯均早赵简子百余年。或谓齐桓侯为战国时田齐桓公田午，在位于公元前367年以前，又晚赵简子百余年。《韩非子·喻老篇》亦载有扁鹊事，齐桓侯作“蔡桓侯”，年代相去更远，于公元前714

年至公元前 694 年在位，是为春秋早期。所以《史记》所载扁鹊事迹年代不确。且《史记·扁鹊传》并不载扁鹊著《难经》一事。成书于两汉之际的《汉书·艺文志》也未载《难经》书目。据此，杨玄操所说扁鹊著《难经》实无稽考。《难经》非扁鹊之作，还可以从《脉经》的内容得到佐证。晋·王叔和所著《脉经》，基本沿袭了《难经》的脉学理论，并大量引述《难经》原文。然而《脉经》卷五的五篇内容除第一篇为“张仲景论脉”以外，其余四篇分别是“扁鹊阴阳脉法第二”、“扁鹊脉法第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这四篇内容除少量与《内经》文字相近外，均不同于《难经》。文字气象似乎更古远，是否真正为扁鹊遗文，不得而知。极可能是《史记·仓公传》中仓公淳于意从其师公乘阳庆处所受《黄帝扁鹊脉书》的内容。这里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王叔和在编撰《脉经》过程中，同时引述了《难经》和“扁鹊遗文”。也说明王叔和时代尚无扁鹊著《难经》的说法。王叔和更没有认定《难经》为扁鹊的作品。否则宗法《难经》脉学理论并大量引述《难经》文字而著成的《脉经》一书，其内容中再另立子标题为“扁鹊脉法”是不可思议的。从另一角度而论，《难经》是阐述《黄帝内经》疑难问题的著作。《黄帝内经》一书从唐宋时即开始质疑为黄帝所著，现在经考据，《黄帝内经》大致可定为西汉《史记》以后的著作。《内经》成书年代的重新认定，无疑会否定秦越人著《难经》的说法。另据《六十三难》有“蛟行喘息”句，首见于西汉末宣帝时王褒《洞箫赋》。如此种种表明，《难经》成书年代的上限应在首载《黄帝内经》书名的《汉书·艺文志》之后，下限应在首载《难经》书目的《伤寒论》之前。所以说《难经》应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二、《难经》的主要内容

《难经》的总体内容，是择取作者认为《内经》中较为重要或是作者有心得体会的部分问题进行阐述。虽设为“八十一难”，但

实质上可归纳为六大类：第一类问题主要是讨论脉学，即第一难至二十二难。其中包括脉学理论，诊寸口的机理，寸关尺分位的机理及其内在含义，脉理与呼吸气息的关系，脉法与天地阴阳以及五行、时序的内在联系，诊脉的要领，经脉病变。第二类问题讨论经络理论，是从第二十三难至第二十九难。主要论述十二正经及任督二脉的部位和分属、走向及长度，十二正经流注，奇经八脉的功能作用，十五络的分属关系，心包与三焦两经的特殊性、经脉病变的反映，经脉与脏腑、阴阳五行的关系等。第三类问题是三十难至四十七难，主要讨论脏腑气血理论，阐述了脏腑形态气机与营卫气血、神魂魄意志的关系，心包与三焦功能与形态的特殊性问题。第四类问题是从四十八难至六十一难，主要讨论病证。阐述了六淫邪气和饮食劳倦的发病规律，五脏病变的机制和传变规律，证候的神色和脉象表现等。第五类问题是从六十二难至六十八难，主要讨论腧穴。阐述了井、荥、输、经、合五腧穴的含义和原理，原穴的特殊意义。五输穴的脉学原理，十二原穴的取穴法，腧穴在发病、诊断和治疗上的意义等。第六类问题是六十九难至八十一难，主要讨论针法，阐述针刺要领和补泻法。

三、《难经》对后世的影响

《难经》问世以后，很快对后世的医学和医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张仲景，张氏在撰著《伤寒杂病论》过程中，在医学理论的阐发方面，《难经》是其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张氏在《伤寒论·序》中谈到：“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纵观《伤寒杂病论》一书，张仲景直接引述《内经》（即《素问》、《九卷》）的文字极少，而引述《难经》文字可见多处。这可能是《难经》在某些方面比《内经》更接近临床之故。

《难经》的脉法理论是在独取寸口的基础上进行阐发，并创立

寸关尺三部分位之说。晋·王叔和所撰著的脉学专书《脉经》，从方法论角度，基本上沿袭《难经》的脉学理论，即独取寸口，寸关尺分位主脏腑。可以说，王叔和《脉经》的问世，才使得《难经》独取寸口，寸关尺分位之说形成一个独特的脉学体系而流传应用至今。这可能是《难经》对后世医学影响最深的一个问题。

《难经》中有关奇经八脉的理论，部分内容与《内经》不合，但也补充了《内经》在这方面的不足。关于五脏之积的临床资料，《难经》也较之《内经》全面。晋·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中直接引述了《难经》的这些文字。

《难经》对后世医学影响较大的另一个问题，是右肾为命门说。在《三十难》中强调：“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此说不仅指出了命门为实质性脏器，而且固定了寸口脉右尺部为其诊脉部位。此说逐渐形成后世命门理论中的一个学派。晋代王叔和，元代滑寿，明代李梴不但坚持右肾为命门说，而且在多方面有所发挥，以至于现行中医理论中无论生理病理、脉诊、方治，都有以右肾为命门学说为基础所作出的解释。与右肾为命门相关的还有“肾间动气”说。第八难：“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以此为理论依据，明代医家孙一奎又创立了“肾间动气”为命门的说法。

四、《难经》对《内经》的贡献

《难经》历来被视为中医学术领域中的经典著作之一。它实质上是《内经》最早的专题注解本。综观《难经》全书，从对《内经》的继承和发挥而言，它最突出的成就可分为三方面。其一，阐释并发挥了《内经》中某些较重要的问题。如《三十一难》对《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有关三焦部位和功能作用的进一步阐发，并补充了三焦所治的具体部位。其二，《难经》保存了不见于现行《内经》的部分文献资料。如《十六难》的“内外证”内容，《四十五

难》的“八会”内容、《五十二难》的“脏病腑病”的鉴别方法、《五十六难》中有关“五脏之积”的临床表现与鉴别方法。另外，《六十难》的“厥痛”、“真痛”问题、《四十四难》的“七冲门”之说、《六十一难》有关“工巧神圣”的含义等等，均为现行《内经》之外的内容。出现以上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内经》在流传过程中，在隋·全元起以前第七卷即已亡佚。其他篇卷也有不同程度的散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内经》面貌和《难经》成书时流传的《内经》，肯定大有出入。二是《难经》的部分理论依据可能另有师承。这两点均可称为《难经》在保存文献资料方面的重要意义所在。其三，《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创立了新的学说：一是首创寸口脉的“寸关尺”三部诊法。《内经》脉法，以遍诊和三部九候为主。虽然《素问·五脏别论》提出了“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理论，但未指明具体的取脉方法。《难经》在此基础上树立新说，多方讨论寸关尺分位及脉象成因和主病的若干问题，为后世中医脉学主流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提出心包与三焦“有名而无形”的观点。并创立与《内经》有别的“命门”理论，提出“左为肾、右为命门”及“肾间动气”说。三是系统论述了经脉长度，十五络原出，奇经八脉循环和功能特点，经脉病证表现等。四是更详细地阐释了井、荥、输、经、合五输穴及原穴、俞穴、募穴的作用，并以五行生克的理论提出“虚者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针刺治疗原则。五是在临床病证理论上，阐发了五脏生积、六腑成聚的机理和临床证候特点，在外感病方面提出了广义伤寒的见解。

五、《难经》解读《内经》方面出现的谬误

《难经》内容有多处与《内经》经旨不合之处，这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难经》所依据的医学文献源流不仅是《内经》一家。其二是《难经》所依据的《内经》版本更接近原貌。因为《难经》成书时，《内经》问世流传尚短暂，《内经》还保持着原有的

风貌，而现行《内经》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多有窜易，篇卷亦有所散佚更迭。其三是《难经》作者本身的问题，即对《内经》部分文字经旨没有深层次的领悟，甚至出现误解文义的情况，这就势必会出现两经指归相龃龉。这里对《难经》中需要正本澄源的几个重要问题加以说明：一是有关“独取寸口”的问题。独取寸口，这首先是将往古丰富多彩的脉诊引向偏狭。虽然《内经》也涉及了“独取寸口”，但这些在《素问·五脏别论》中仅寥寥数语。而《内经》中的“别论”是“另家别说”，不是主体内容。《内经》中主述的还是“遍诊法”和“三部九候法”。《难经》把“独取寸口”发挥到了极至。并在寸口部又强分寸关尺而分主五脏六腑，这不但没有内在的可以说得通的生理依据，也缺乏相应的临床诊断实践来印证。所以《难经》以后所流传的脉学资料仍是探讨、研究、应用脉搏的频率、节律、动势、层位、宽窄度、流畅度等因素所体现出来所谓的“脉象”。这也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脉象，与寸关尺分属五脏六腑几乎没有关系。二是《难经》的“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说法，也是偏离《内经》的歧说。《灵枢·根结篇》有“命门”的说法，指的是两目。《难经》既然将右肾视为一个独立的脏，那么相关联的脏象学说和相连属的经络学说则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体系。这个体系，《难经》并没有建树，而仅仅提出了一个说法而已。所以，后世依据《难经》所形成的命门说仍然依附在“肾”的系统中。三是《二十二难》提出的所谓“是动病”和“所生病”。这是《难经》作者对《内经》原文理解上的错误。错误的关键是对《灵枢·经脉篇》文字理解不透，对内容断章取义，出现了概念上的千古之谬，并影响了后世一批不求甚解的医家，因循《难经》之误。直至明代张景岳及清代徐灵胎，才明确指出《难经》作者理解上的错误。

六、《难经》的主要注家和注本

《吕氏注众难经》，此书是现存资料所查证的最早《难经》注

本。为三国时吴国太医令吕广所著。吕广，隋人避炀帝讳称吕博。据称吕广“少以医术知名，善诊脉论疾，多所著述。吴·赤乌二年，为太医令，撰《玉匮针经》，及注《八十一难经》，大行于世。”此书原本已佚，其少量注文收入明·王九思的《难经集注》中。

《杨氏黄帝八十一难经注》，为唐初前歙州歙县尉杨玄操著。原书亡佚。其序及注文收入唐·开元间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的《扁鹊传》中。少量注文被明季王九思辑入《难经集注》。

《丁氏难经补注》，为宋·嘉祐年间丁德用在杨玄操所注《难经》的基础上加以补注。此书佚，注文收入王九思的《难经集注》中。

《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作者李駉，字子野，号希范子，南宋·咸淳年间医家，于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成书。李氏是早期以图释经的医家，对后世诠释经典过程中以图示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李氏之注只是一般诠释，并无多少独到见解。明代医家吕复评论说：“李子野为《难经句解》，而无所启发。”李氏的《难经句解》是现存较早的注本，其文献学价值较高。

《难经本义》，作者滑寿，字泊仁，号撄宁生，元代著名医家。《难经本义》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成书。滑氏依据隋唐经籍艺文志所载，将《难经》重新厘定为两卷。于两卷正文之前，首列《汇考》一篇，阐释《难经》名义及源流。次列《缺疑总类》一篇，论《难经》中的脱文误字。又次《图说》一篇，绘图十三幅，作为以图示意的辅助性资料。滑氏依《难经》一至八十一次第逐条诠释，摒去杨玄操十三类分注体例。其注释的方法是“融合诸家之说，而以己见折衷之”。滑氏所辑之始本，元以后相继散佚，此书客观上又起到了保存十一家之注部分资料的作用。滑氏原本以儒治业，经史百家之学造诣颇深，通解古书文义，因此其注释辞理畅达，旨义昭明，并且辩论精辟，考证亦极详审。能探其隐赜，钩其玄要，辨疑正误，颇能发明经旨。遇有医理精当

处，则以《内经》经旨印证之。滑氏的另一特点，主张对《难经》经文的理解，应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而灵活掌握，不可泥于文字而拘止一端。因此可以说，滑氏的《难经本义》是《难经》注本中的佳作。

《难经集注》，作者王九思，字敬夫，明代陕西鄠县人，弘治进士。任郎中，兼通医学，于宏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辑注成书。本书以杨玄操的十三篇分类法编次。在王九思之前，集注《难经》的书籍在北宋年间已具规模，可能为宋仁宗及英宗年间翰林医官王惟一辑录并校订而成。本书共辑录五家之注，其中收有吕广、杨玄操、丁德用、虞庶之注文。另有杨康侯辩驳丁德用之说两条。杨康侯生平不详，其余条文与杨玄操之注相混，不可辨别。此书在历代流传过程中，注家参与其事者较多，注文窜易，版本驳杂。日人丹波元胤《医籍考》评论说：“旧藏庆安版，虽未见祖本，题曰王翰林，则非惟一之旧也。是书视之于滑氏之融合众说以折衷之，则醇疵淆混，似不全美，然吴吕广以下之说，得籍以传之，要之医经之有注当以此为最古也。”由此可知，此书是历代多人校注整理而成。至明代王九思、石友谅、王鼎象重新校正刊行。此书只是辑录诸家之注，王九思等人未作任何发明。它的价值在于保存了自三国时吕广以至唐宋时四位早期注家的注文，五家所著之书均已散佚无存。故从文献学角度，《难经集注》较为珍贵。

《图注八十一难经》，作者张世贤，字天成，号静斋，浙江宁波人，明·正德年间名医。于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成书。此书八卷，每难均附有绘图，以助昭明书义。此书是以注附图详加阐释，注释折衷诸家之说，并参合己见，其特点是注释通俗浅显，易于理解，但其注文似嫌冗长，于经文的解释，亦欠深刻。甚至不必有图而强以图解，不免蛇足之嫌。《四库提要》对其评价说：“世贤是编，于八十一篇，篇篇有图。凡注所累言不尽者，可披图

而解。惟其中文义显然，不必待图始解者，亦强足其数，稍为冗赘，其注文亦循文敷衍，未造深微。”如此评价，可谓中肯。

《难经经释》，作者徐大椿，字灵胎。原名大业，晚年号洄溪老人，江苏吴县人，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著名医家。一生著述颇丰，此书成书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徐氏认为：“《难经》非经也，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古人书篇名义，非可苟称。难者，辩论之谓。岂天下有以难名为经者？故知《难经》非经也。”徐氏意为“难”字是辩论之义，而“难经”是通过辩论而阐发《内经》奥旨，所以《难经》实为《内经》的羽翼之作。徐氏注释《内经》的方法和体例是：诠释《难经》首先取证于《内经》，如无经文可证，则引证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时也引及皇甫谧的《甲乙经》或王叔和的《脉经》。每难之中以按语的形式论说是非，阐发己意。徐氏评判《难经》大体分三种情况：一是《难经》高出《内经》，认为《难经》阐《内经》之未发，或是补《内经》之不足。二是当《难经》与《内经》不合或有牴牾时，认为《难经》别有师承，从而丰富了医学理论。三是《难经》本身的不足，认为《难经》作者曲解《内经》，行文尚不如《内经》畅晓明白，而批评《难经》多语病。甚至在评论《十五难》时，尖锐地指出：“此一难不过错引《素问·平人气象论》及《玉机真脏论》两篇语，不特无所发明，且与经文有相背处，反足生后学之疑，不知何以谬误至此。”徐灵胎不但医术高明，遇事明察秋毫，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乾隆年间曾“两蒙圣天子蒲轮之征”，入都为朝廷重臣视疾，可知其人之医术被世人所钦重。徐氏精明而洞达事理，通过“雍正二年，当事大开塘河”，以及“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苏抚庄公欲开震泽七十二港”事，在当时浩大的水利工程中，皇帝依据徐氏的见解而“赋工属役”，从而可知徐氏的高明之处。徐氏的睿智，还体现于对《难经》的认识，能全面客观评判《难经》，褒贬各得其

宜，徐灵胎可能为第一人。徐氏还依据自己的研究考证，否定秦越人著《难经》。徐氏云：“其曰秦越人著者，始见于《新唐书·艺文志》，盖不可定，然实两汉以前书云”。徐氏的《难经经释》是《难经》注本中的上乘之作。

《古本难经阐注》，作者丁锦，字履中，号适庐老人，松江人。清雍正、乾隆年间著名医家。此书刊行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丁氏自称获古本《难经》，其条文次序与通行本有出入者达30余处。丁氏以此本为基础，参考通行本校定并加以注释而成。丁氏所获古本，虽不知其祖本源流，从校勘学角度而论，有一定文献价值。丁氏此书注释通俗浅显，并对某些病证提出了具体方治，对研习《难经》有所裨益。

《难经正义》，作者叶霖，字子雨，江苏扬州人，为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名医，兼通西学。此书约成书于同治年间。叶氏此书是《难经》次注版本中较精善者。其注释的宗旨和方法是：“谨考经文，寻其意旨，旁采群籍。资为佐证，质以诸贤之笺释，西士之剖验，以正其义。”本书体例，每难经文，分为几个段落，然后依段落诠释阐发，遇有与《内经》有出入者，则引《素问》、《灵枢》原文进行对照，核其异同而会通之。阐释过程中，遇有难解字词则首先诠释或注音，然后阐释经文。叶氏生于晚清，西方医学在我国已有一定影响，理论方面也具备一定基础。叶氏吸取了部分西医学知识来诠释《难经》的脏腑部分，开征引西学阐释古经之先河。对四十二难中“心有七孔三毛”的解释，叶氏引用西学解剖知识加以阐释。对中医所谓心的功能问题，叶氏只谈“心乃运血之脏，而主百脉”，并未对经文中“主藏神”作解。这说明，叶氏不但对西医的解剖学有相当的了解，对西医的生理学亦有某种程度的认可。叶氏《难经正义》是诸注本中较独到者，对诸多问题有所发明，是学习《难经》较好的参考书。

七、此次注释出版说明

《难经》自问世以来，虽代有亡佚，然自三国时吕广以降，整理注释者亦不下数十家。但这些注本因传抄辗转，时有散亡，又时有辑佚，原文及注释均不免驳杂。各家之注也互有瑕疵。大都为不作鉴别的因循之注。清人徐灵胎能独具慧眼，对《难经》的成就及不足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其所著《难经经释》也是各注本中较好的一种，故《难经经释》也是这次整理出版的版本依据。其最早的版本是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徐灵胎洄溪草堂自刊本。此次出版原文是以乾隆年间半松斋《徐氏医书六种》本为底本，并以元·滑寿《难经本义》、明·王九思《难经集注》互校。其校勘原则是，各本互有出入，但无害大义者，则依据底本不校，底本义胜者不校，不校难得其解者，则在原文之后括号内出校，并注明校本依据。原文不作处理，以保原貌。

此次编写体例是：首录原文，次为注释。出注以文句为主，解词解句，阐明大意。生僻字另解义。释文之下广辑历代各家之解，以备参稽。各家注释选择的原则是：王九思所辑五家之注，虽良莠不齐，因是现存《难经》最早的注文，故全部收录。然五家之中杨玄操与杨康侯两家之注在流传过程中已混淆不清，难以辨别，故以“杨曰”标注。滑寿之《本义》，是《难经》较好的注本，但其引述了大量《集注》中各家注解，为避免过多重复，只选择了滑氏本人较精当的注文。徐灵胎之注比较理性化，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一味因循旧说，注中见评，褒贬合宜，并有独到见解，此次全部录用。叶霖之《正义》，因是晚期作品，占有资料较多，能广集各家之长，注语中较合理地采用了部分西医的知识，较有新意，这次也全部撷取。另外，徐、叶两家均为注中夹按，徐氏之按以评述为主，故大都揉入评介项中。叶氏之按偏于发挥，仍附于叶注之下。次为语译，译文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以期确切流畅。原文尚无确解者，权且译之，以使文意顺达。最后为评介，以撮要

旨，阐明指归。评述褒贬其中，以期使瑕瑜分明，但据理不确者，不妄加评论。

关于文字处理，原文中的古字、异字及通假字，不作处理，仍保原貌。注释、语译及评介中均用现行规范字。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编者才拙质陋，谬误难免其中，望圣贤赐教。

牛兵占

2003年8月于河北医科大学

杨序

黄帝八十一难者，斯乃渤海秦越人所作也。越人受桑君之秘术，遂洞明医道，至能彻视腑脏，刳肠剔心，以其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乃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世或以卢扁为二人者，斯实谬矣。按黄帝有内经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殆难穷览，越人乃采摘英华，抄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轴，伸演其首，探微索隐，传示后昆，名为八十一难。以其理趣深远，非卒易了故也。既弘畅圣言，故首称黄帝。斯乃医经之心髓，救疾之枢机，所谓脱牙角于象犀，收羽毛于翡翠者矣。逮于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解，亦会合玄宗，足可垂训，而所释未半，馀皆见阙。余性好医方，问道无涯。斯经章句，特承师授。既而耽研无涯，十载于兹。虽未达其本源，盖亦举其纲目。此教所兴，多历年代，非唯文句舛错，抑亦事绪参差。后人传览，良难领会。今辄条贯编次，使类例相从，凡为一十三篇，仍旧八十首。吕氏未解，今并注释。吕氏注不尽，因亦伸之，并别为音义，以彰厥旨。昔皇甫玄晏，总三部为甲乙之科。近世华阳陶贞白，广肘后为百一之制，皆所以留情极虑，济育群生者矣。余今所演，盖亦远慕高仁，迩遵盛德。但恨庸识有量，圣旨无涯，绠短汲深，玄致难尽。

前歙州歙县杨玄操序

滑序

《难经本义》者，许昌滑寿本《难经》之义而为之说也。《难经》相传为渤海秦越人所著，而《史记》不载，隋唐书经籍艺文志乃有秦越人《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之目。岂其时门人子弟，私相授受，太史公偶不及见之耶。考之《史记正义》及诸家之说，则为秦越人书不诬矣。盖本黄帝《素问》《灵枢》之旨，设为问答，以释疑义。其间荣卫度数，尺寸部位，阴阳王相，脏腑内外，脉法病能，与夫经络流注，针刺俞穴，莫不该备。约其辞，博其义，所以扩前圣而启后贤，为生民虑者，至深切也。历代以来，注家相踵，无虑数十，然或失之繁，或失之简。醇疵杂混，是非攻击。且其书经华佗煨烬之余，缺文错简，不能无遗憾焉。夫天下之事，循其故则其道立，浚其源则其流长，本其义而不得其旨者，未之有也。若上古《易》书本为卜筮设子，朱子推原象占，作为本义，而四圣之心以明。《难经本义》窃诸此也。是故考之《枢》《素》，以探其原；达之仲景叔和，以释其绪。凡诸说之善者，亦搜而博致之，缺文断简，则委曲以求之。仍以先儒释经之变例而传疑焉。呜呼！时有先后，理无古今。得其义斯得其理，得其理则作者之心旷百世而不外矣。虽然，斯义也，不敢自谓其已至也。后之君子见其不逮，改而正之，不亦宜乎。

至正辛丑秋九月己酉朔自序